

大学之忧丛书
刘东主编

知识工厂

——废除企业型大学并创建真正的高等教育

[美] 斯坦利·阿罗诺维兹 (Stanley Aronowitz) 著

周敬敬 郑跃平 译

The knowledge Factory

Dismantling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and Creating

True Higher Learning

作者在分析大量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什么是高等教育真正的目的？”“高等教育如何进行革新才能实现其真正的目的？”作者揭示了当前美国高等教育存在着的“智力衰退”弊端，指出大学已经沦为培训的场所，学生被动地接受僵化的知识，不具备批判创新精神，大学校长越来越像企业的 CEO，而不是学术带头人。凡此种种现象表明，高等教育已经丧失了其神圣的教育使命，必须进行全面革新。作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革新办法，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改革教育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反思和借鉴。

此书自出版以来，在西方学术界被广泛引用，是研究高等教育的必备参考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之忧丛书 刘东主编

知识工厂

——废除企业型大学并创建
真正的高等教育

Zhishi Gongchang

[美] 斯坦利·阿罗诺维兹 (Stanley Aronowitz) 著

周敬敬 郑跃平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字 : 01-2010-6340 号

The Knowledge Factory: Dismantling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and
Creating True Higher Learning

Copyright © Stanley Aronowit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工厂 : 废除企业型大学并创建真正的高等教育 /
(美) 阿罗诺维兹 (Aronowitz, S.) 著 ; 周敬敬, 郑跃平
译.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3

(大学之忧丛书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 The Knowledge Factory: Dismantling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and Creating True Higher Learning

ISBN 978-7-04-032838-7

I . ①知… II . ①阿… ②周… ③郑… III . ①高等
教育 - 研究 IV . ①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1194 号

策划编辑 丁艳红
责任校对 陈旭颖

责任编辑 丁艳红
责任印制 韩 刚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马敬茹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3.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2838-00

献给我的妈妈Frances Aronowitz-Helfand, 她在参加了曼哈顿社区学院（Borough of Manhattan Community College）的职工教育中心的学习之后，又于1987年进入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读书，并在74岁高龄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再序《大学之忧》丛书

劈头就写下“再序”二字，是因为早已编过这套丛书，也早已为它写过了序文——而且还是一篇超长的序文。按我当时的设想，对于首批推出的那些教育论著，若不能逐一进行串讲，就无法呈现内容的衔接，也就很难收到预期效果。

在那篇序文中，针对那种无原则地吹嘘西方学府，尤其是自己的西方母校的做法，我曾发出了这样的议论：

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考察过别人究竟遭遇到了怎样的当代忧虑，以及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历史线索，才引发出了今天的这番忧虑，就基于其先入为主的西学崇拜，而张扬起别人已被瓦解的早年理想了——充其量到头来也再只能基于这种遥远的理想，捎带着也埋怨一下莫明其妙的西方竟也能今不如昔。这样隔靴搔痒的空疏议论，姑妄听之也就罢了，要是真想用来祛疾伐病，那还不耽误了大事！^[1]

不料，偏是上文中所谓忧虑的“忧”字，在当时的编者那里引起了真正的担忧，以致合作起来总是不顺——仿佛“大学之忧”这样一个标题，果然包含了多么不能见容的异议。然而，在这样的大是大非上，我却没有办法妥协。因为，意识深处的“忧患意识”，正是华夏民族不可稍离的警戒线，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慷慨自许，也表现出了最可宝贵的利他倾向。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是从阅读徐复观的著作开始的：

“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

[1] 刘东：《众声喧哗的大学论说》，载《道术与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1]

——更何况，这套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译丛，还不过是引进和传达别人的忧患！难道就连别家有病都不许谈论了么？连了解一下别人的疼痛都不能见容了吗？

然则，就我本人的目力所及，似乎大洋对岸的教育学研究，大多都在表达着这种忧虑。尽管按照几乎被当作圣物的大学排行榜，他们简直拥有了所能梦想的一切优势，可人家还是在不断地自我批评，正如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所述：

高等教育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离不开它，也相信它的价值。当它带给我们失败，我们就变得失望；而当它开销太大，我们就变得愤怒。这种超乎寻常、至关重要的机构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逐渐成为今天这种状况的？^[2]

也正是借助于他们的忧思，我们才较为清晰地看到，尽管那边无论如何还算享有相对正常的学术秩序，尽管那边不管怎样也拥有举世最大的学者队伍，但那些几乎漂在钱海里的大学，却仍然不能被称作理想国。恰恰相反，人们仍有太多的理由去为它伤神和忧心：

- 忧虑它的过度市场化和企业化，它的文化精神流失；
- 忧虑它的批量生产和形式主义，它的暗中鼓励平庸；
- 忧虑它的集体腐败和拉帮结派，它的风格日渐趋同；
- 忧虑时而出现弄虚作假和剽窃，它被恶俗世风污染；
- 忧虑它像飘蓬一样无根地变异，它丢失了原有的传统；
- 忧虑它太贴向财大气粗的金主，它失去了独立地位；
- 忧虑它虚掷纳税人的辛勤血汗，它有违于公平原则……

果然也还是问题山积吧？不过，也要平心地说一句，无论出现了多少问题，又正因为他们还保持着这样的忧患，还可以自由地发表这种忧患，还可以再由此去呼吁革新，他们的大学才保持着相对的优势，成为当代美国屈指可数的国家优势之一。

而对中国读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些辛苦译的别家忧思中，还

[1]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阎凤桥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可以看出某些潜在的先机：一方面，那边如此雄厚的教育机制，尽管一时占尽天下的优势，却仍自潜在着诸多的缺憾，所以放眼历史的长时段，也未必就真不能被我们超越。当然另一方面，真想赶上和超过别人的话，就既不能憋在家里土法上马，用粗放的行政合并来滥造超级大学；也不能不假分辨地全盘照搬，甚至搬来了别人的教训和痛处！

必须时刻牢记，这种文明间轰轰烈烈的潮起潮落，绝不是念几遍“河东、河西”的真言，就可以安稳地坐等的。它需要几代人的接续努力，更要求我们打从现在起，就在“读”与“思”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从而足以借助于丰富的联想力，去举一反三地检思自我们这边或许同样令人担忧、充其量只是暂未积重难返的问题。

还要记住，无论怎样好高骛远，总还要从脚下的这一步做起。毕竟，知识阶层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坚持不懈的、不屈不挠的、作为神圣使命的深刻反思。整个社会都指着我们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来清扫积弊呢，要是我们连自己安身立命的中国大学，都不能反思和打扫清楚，那么其他的一切就完全谈不上了！

主编 刘东

2010年8月5日于静之湖沐喧堂

前言

虽然我常被指责为沉迷社交，但我一直很喜欢学习新事物。这种学习常带我离开社交生活进入到书本、文章以及图书馆中去。没有什么事情比发现触动我内心的新观念更令人愉快的了。但在漫长的人生中，我有时需要提醒自己不要鲁莽拒绝那些挑战我习以为常的观念的“新”东西。我越激烈反对的那些奇怪而且常常轻蔑的观念，最后越可能被我接受，至少有时会是这样的。出于这个原因，我趋向于怀疑那些已被接受的智慧，也许这使我从来不接受那些已成规条的知识。

我写这本书并非仅仅出于那种智力上的好奇，在超然的探究中有时这种好奇会启发我。这本书还始自我个人的经历。我教的是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但也时常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并且在公立中学和大学之中以及之外实践这些方法。从1970年到1979年，我是“二战”后纽约市立第一实验高中的策划者及主任。到1999年5月，我已经在4所大学里面担任教师长达26年时间里——一所社区学院、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一所常青藤盟校，以及全国位于城区的大学中最大的一所研究生院。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虽在学术圈中，却并非学术之人。像许多完成了各种层次的学位的人一样，我总是不确定我为什么要拿到这个学位。我那非正统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972年我被聘为史泰登岛社区学院助理教授的时候。那时我39岁，只有新学院* (New School) 的一个本科学位。我是在一个今天难以想象的情形中拿到这个学位的。

直到高中毕业，我在学校中最值得记住的经历是在六年级的时候，研究语言的海伦·哈里斯博士指导了我。后来，母亲告诉我教育委员会在布朗克斯区的PS57学校安排了一项进步的教育实验。这个实验项目的课程包含了除数学外的所有学科。我们学习地理、文化，以及关于意大利、墨西

ix

* 新学院位于纽约，由一些费边社会主义者于1919年建立，因其前卫的教学方法而著名。——译者注

哥和俄罗斯的历史。我们用他们的语言唱他们的国歌，看他们的作家写的故事。我知道我从哈里斯博士的课程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因为我现在仍能唱这些歌，虽然有些歌词已经忘了，而且我对这些文化也不再有热情。

在哈里斯博士看来，我是一个聪明但是调皮的孩子，经常用自己的说服技巧引得一些没那么聪明的学生走歪门邪道。结果我的朋友和我常因捣乱被带到校长办公室，我母亲也不止一次被叫到学校来“解释”我的鲁莽言行。但是在哈里斯博士的课堂中，我从幼儿园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学校的知识也可以是有趣的和激发智力的。六年级成了我用以衡量我后来的学习标准，而无一例外，之后的所有课程都不及格。七年级也不是一无是处，因为我学会了打字，若非如此，以我那糟糕透顶的书写，我相信这本书和我其他的书都不可能写出来，更不用说给那些编辑读。

我注册的“快进”项目可以让我一年内完成两年的初级高中课程。在八年级或九年级的某个时候我知道纽约音乐艺术高中有入学考试。如今这个高中成为比它大得多的拉贾迪尔高中的一部分。虽然我从来不是一个有资格幻想成为职业音乐家的小提琴演奏者，我还是通过了这个考试。这个考试考查的是未经特别训练识别音调间隔和旋律的能力。我之所以参加这个考试，是因为我家附近的高中即便在20世纪40年代来看也是较差的公立高中。我没有意识到的是，除了音乐和艺术，纽约音乐艺术高中的其他专业在学术上也是很有挑战性的。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学校的老师的质量并不突出，有些甚至是不称职的。没有英语老师能够启发我，数学知识靠死记硬背，科学课实际上让你讨厌科学，只有一个社会科学的老师能够吸引我的注意力。像系里的许多人那样，除非他被骗了会费，奥古斯特·戈尔德先生可能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党成员，以及那时很活跃的消费者合作运动的成员。他是查尔斯·比尔德的追随者，此人对美国宪法以及美国历史其他方面所做的经济学解释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那时的教科书对这些的解释宣扬命定论以及英雄论。被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称为进步派的历史学家被视为传统观念的挑战者，有时也被不正确地指责为马克思主义者。

像其他足够好的高中一样，挽救纽约音乐艺术高中的也是它的学生们。他们分为两派：一派是专业导向的，大多数学音乐的醉心于表演，而学

艺术的则分成商业和艺术两个相当的阵营；另一派同样多的人，包括我自己，虽然有些艺术爱好，但主要是为了躲开我们生活的区域的狭隘环境。许多人是那些支持罗斯福新政的人的子女，有些是激进人士的子女。这些激进人士多数是共产主义者，而随着“二战”爆发而事实上停止的知识分子激进主义模糊了激进派人士与共产主义者的区分。有些是劳动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成员，同情广义的左派，但由于他们注定要移民到一个新建的以色列国家，所以与美国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那些年轻的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激进派常常聚在一起，并且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相当一小部分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在我们这个有1 800人的学校里，“进步青年”有250人，而在1948年总统选举中，在我们学校为第三方候选人、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进行了一场民意测验。我们聚在美国劳动党在本地的俱乐部，有大概一百个学生参加每月聚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学校中表现良好，但是我们真正受教育是在我们自己组织的学习小组中和编排的戏剧中。

我们中的有些人参加了共产党控制的杰弗森社会科学学院，在这里我们学习从戏剧到马克思主义信条的所有东西。杰弗森学院成了我真正意义上上过的大学。在16岁的时候，我在马克思主义学会学习，在学习其他科目的同时，也学习哲学。我们阅读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泰勒斯、阿那克希曼德、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为了反驳它）、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们被视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先行者。我们研究笛卡尔和英国经验主义者，特别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他们证明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无能。我们学习了马克思如何扬弃黑格尔的思想，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论而保留其辩证法。这些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但是我阅读了臃肿不堪的英国黑格尔主义者约翰·贝里翻译的《精神现象学》的大部分。最终，我研究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以及其他作品。一份列宁和斯大林的长长的菜单把我们带到了人类知识的顶端。我的一些老师很有启发性，特别是后来到波士顿大学和巴鲁学院的马克思·沃托尔斯基，以及哈利·威尔斯，一个非常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在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的指导下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他的论文，他发表了一连串对实用主义的攻击文章和对弗洛伊德更为温和的唯物主义的批评。

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小组是相当分裂的，不仅有未来的雅沙·海

菲兹们和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们，或者在当时的艺术课程中没有一席之地的未来的抽象表现主义者，还有我们中间的政治冷淡者——虽然我们也许对他们有些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我结交了一些长期的朋友，但是课程对我影响甚微。我对数学和科学毫无兴趣，而我在英语和社会研究上的高分则要归功于我阅读的其他文本。事实上，当我到了上大学年龄的时候，我对我将做的事情毫无了解。但是我父母的热切盼望战胜了我推延深造的强烈愿望。

事实上，我仅仅能够考入布鲁克林学院。成立于1931年的布鲁克林学院是纽约仅有的四所高级公立学院之一，它的录取标准比久负盛名的城市学院要略低。像当时其他的纽约市立学院一样，布鲁克林学院也是免学费的，否则我是无法去读大学的，因为我的家庭不愿意——可能也没有能力——支付学费。后来我也没有待得很久，因为当我来到布鲁克林学院的时候，麦肯锡主义正横行一时。

纽约州的立法机构制定了《费因伯格法》，禁止共产主义者在公立学校和大学教书。布鲁克林的校长哈里·吉迪恩斯在一定程度上践行悉尼·胡克的学术自由观念：教员们有言论自由，只要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其支持者。学生们有权质疑权威，但是要在“文明”的规则限度内，也就是说，学生无权强闯校园设施抗议学校当局及其政策。在我一年级那年，学校管理局取缔了学生报纸，因为编辑反对他们拒绝给予劳动青年联盟合法俱乐部的身份，这个联盟是支持共产主义者的学生组织。作为一名“进步青年会”（有合法身份）的成员，以及哲学社的主席，我和其他7名学生领袖一起支持对学生处主任的示威。400个学生以及8个学生领袖，包括我在内，因“与学生身份不符的行为”被勒令休学。如果我们愿意为自己不服从的行为道歉的话，学校可以给予我们“留校察看”。有些高年级学生为了能够毕业以及避免在成绩单上留下“不轨”记录而屈服了。我是3个拒绝道歉者之一。被勒令休学后，我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学校，一去就是15年。

我很快地成了一个工厂工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后来，为了离工作地点近点，我搬到了纽瓦克，有了第二个孩子，还成了工会和社区事务的活跃分子。对我而言，20世纪50年代不是令人沮丧的，而是令人兴奋。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我的眼界仍十分局限于本地的话，那么，到20世纪60年代，我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新社会运动的漩涡之中，这些运动首先是关于公民权利，而后是关于

学生及和平运动。在这个时候我搬回了纽约，将与我疏远的妻子和孩子留在了新泽西。我在周末去看他们，提供经济资助，但我放弃了为人父日常的职责。

事实上，我的学术生涯始于1964年。那时我受邀加入了《左翼研究》（*Studies on the Left*）杂志的编辑委员会，这个杂志四年前由一群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的威廉·阿波曼·威廉的研究生创办，它也许是成长中的美国新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杂志中最有影响力的。在那时，我刚离开制衣工人联合会。在那里我组织了工会的抵制活动以及它的一些全国性的竞选运动来赢得东北部石油、化学与原子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的工作。我应邀加入《左翼研究》主要是因为我的工会经验，以及我与民主社会学生团（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有联系。我是民主社会学生团里的经济研究及行动项目的导师，这个项目把大学生送往北部大城市的黑人以及白人贫困社区。我安排了一个小组前往纽瓦克的克林顿·希尔区，在那里，我曾担任副主席的一个活跃的社区组织正与市政厅在一些社区事务上进行斗争。在讨论班和研修会以及为了计划社区组织行动的不计其数的会面中，还有在与未来组织者的非正式交谈中，我教他们组织的基本知识，一些政治经济学以及工人运动的历史。

xiii

由于这些经历以及亲历了那曾朝气蓬勃的工人运动最终退化成一堆官僚机构、功能更像是保险公司而非社会运动后，我开始想写一部关于美国工人阶级及其运动的书。因为美国没有博尔吉亚家族（Borgias）来支持那些想写这书的人，我开始考虑先去读一个本科学位作为第一步，然后最终从事教师职业。当我得知布鲁克林学院有个福特基金会的项目使得我们这些“成人学生”（adult learner）能够获得一个学位时，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我那时已经31岁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抽出时间来完成这个每周3个晚上的强化课程，但我申请并且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GRE）要求中的词汇、数量技巧以及人文的部分。我的数学成绩很平庸，但是在其他两个考试中得分很高，所以被录取了。

我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就退学了。我告诉自己，因为组织的义务与学业有不可克服的冲突。我猜这只是原因之一，主要的原因是我发现课程很无聊。我不记得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抑或两者都令我厌倦。但是很清楚，14年前驱使我离开学校的强烈冲动仍在起作用：简而言之，我缺乏忍受这个4年项目的耐心和动力，这个项目不承认生活经验是合法课程的组成部分。

然而，为了组织运动，我开始写一些比小册子更长的东西。在1964年冬天，我在《左翼研究》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评论三部关于劳工的书，接下来偶尔给《乡音周报》（*the Village Voice*）、《国民周刊》（*the Nation*），以及《解放杂志》（*the Liberation*）写些文章。但是直到1967年春，我不再从事工会的组织工作的时候才重新回到学术圈。通过诺曼·伯恩鲍姆的办公室——他那时是新学院的社会学教授——我把研究生入学考试（GRE）成绩、一些发表的作品以及简历交给研究生教员的主管约瑟夫·格林鲍姆。我的建议是免除本科学位的限制直接进入社会学的研究生项目。他拒绝了，并坚持要求我至少作为一名本科生花一年修完通识教育项目。虽然我被免除了上课的义务，但被安排了一名导师并被要求写一篇专业研究论文。由于那时伯恩鲍姆同时接受了一个艾姆赫斯特学院的教职，一个新毕业的社会学博士和助理教授特伦特·斯洛耶被指派给我。我写了一篇75页的论文，名字是《发达国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拿到本科学位以后，我成为了社会学的研究生。

这次我抱着很高的期望去上课。新学院作为杰出的欧洲知识分子的知识 and 政治的庇护所而享有国际声誉。在那时，它的教员包括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伟大的现象学家阿隆·古尔维奇，写高年级论文时有时去旁听他的课的经济学家阿道夫·洛维，历史社会学家汉斯·施佩尔，以及伦理学家汉斯·约纳斯。当我刚入学的时候，一些更新一代的学者的来访也让学校增色不少。他们大部分是德国学者：杰出的马克思学学者艾林·费彻尔，以及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明星——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而他们中最著名的于尔根·哈贝马斯也是常客。我特别为一位名气较小的学者所吸引，他是来自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学家汉斯·皮特·齐泽尔，他的著作包含有更多的经验取向。他在家中招待学生，并支持关于各种主题的小型沙龙。总体而言，我在研究生院第一年的经历有效减轻了我的恐惧——害怕我在高等教育中的历史会重演。

同时，我参与了很多激进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纽约自由大学（the Free University of New York）。这所大学成立于1965年，位于西14街的一个阁楼，不授予学位，没有学分。其后继者是the Free U and Alternate U（因其向纽约州教育部门的妥协，后者禁止他们使用“大学〔university〕”）。我教些关于政治、劳工以及文化的课程。我的同事有《左翼研究》的编辑詹姆斯·韦

恩斯坦，还有另一个编辑史托顿·林德，此人当时正挣扎在耶鲁大学的一场关于终身教职的战斗中，社会生态学家穆雷·布钦，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支持者、著名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他的朋友、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利奥波德·里奇奥，教授妇女社会史的罗沙林·巴山多尔，与许多作家一起教授诗歌的苏珊·谢尔曼，教授短故事写作的格雷斯·帕雷。表演家和作曲家图利·库福博格以及艾伦·威利斯、罗伯特·克莱斯高都是我班上的学生。后两人在一个小组中，那时这个小组刚刚开始发明摇滚乐批评。那里有写作和绘画课程、周六的儿童项目，以及音乐和戏剧讨论会。它让我想起了杰弗森学院，但是没有了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教条主义者。

xv

这些学校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各种年龄的学生聚在一起学习新东西，同时也结交朋友，而不是为了一个让他们准备好去工作以及开始职业生涯的文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年轻的激进主义者，一腔热血要改变世界。所以除了从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角度看，自由大学并非传授“无用”的知识的机构。但是不像公立或者私立的美国大学和学院，它们的建立不是为了服务国家，或者传播代表国家文化的诸多标志性人物的所思所想。相反，在创立者的思想中充满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的要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不希望，也不盼望融入主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的体系。除了自由大学的左派倾向，我们也融入了非世俗主义的新左派浪潮。我们欢迎自由市场派的自由主义者，像罗斯巴德，因为我们反对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主流的高等教育中非常明显的试图要求在政治和智识上趋同的趋势。在我们的教员中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以及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林德和我自己。

自由大学在不断地使它的管理和政治委员会产生的愤怒的混乱中茁壮成长。将来的老师以激进民主的方式提交他们的课程计划，不仅交给管理部门的小职员，也交给老师和学生的团体，这个团体经常聚会讨论决定学校的政策。所以，典型的课程是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混合物，而且也没有排他原则来保护那些团体认为是“相关”的东西，这个原则常常用来掩盖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在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这个运动以集中主义为荣并唾弃民主——新左派分裂成不同的敌对派别。在1970年，the Alternative U，自由大学存活下来的化身，突然崩溃了。

xvi

我逃离了新学院的来访的德国人。我被迫去选修那些“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学训练出来的人开设的课程。除了那些令人遗憾的教育方法，我发现内容令人痛心的浅薄。有一个老师在课上只是从马克斯·韦伯的文本中读些东西，并不展开讨论或者提供评论。另外一个，虽然是一个更为优雅和开放的人，但是错误连篇，我估计继续上课只会引起我不断的反对和敌意。第二学期开学后的头几周，我考虑是否要从社会学系转到政治经济学系。但是因为我已经相当好地了解马克思、凯恩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我不想为了一个博士学位而再去学一遍这些已然熟知的东西。所以带着些许忐忑，我悄悄地离开了。

在一个独一无二的联合研究生院的项目中，我发现了应对这个学术危机的方法，它提供给像我这样的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它的学位基于写作和学生能力的其他证据。这个学校接受了我的发文记录、我上过的课程、我人生的成就，以及当中最好的，我的关于技术以及对劳工的影响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整合进了我的名为《作为权力的科学》的书中。我跟重要的终身教授以及助手一起工作，但并不上课。当我在1975年拿到学位的时候，学校正在接受评鉴。几年后，学校才通过了评鉴。

简言之，我在位于中间带的“阈限空间”里撰写本书。我不是一个内部人，从未在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完成过学业；也并非一个局外人，因为我在相当多的组成美国学术系统的大学及学院中工作及担任访问教授。如同我所有的书一样，这本书也是批判性的：我假装提供一个并非历史也非社会学的概述，虽然书中包含两者的元素。我从我的经验以及从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中获得知识，而我的观念绝不能塞进科学术语中。

xvii 我的主张是除了个别例外，在美国罕有够资格称为高等教育的地方。这里的“高等教育”指的是学生在那里可以广泛地和批判性地接触到西方知识传统的遗产，以及南半球和东方的遗产。多数的本科课程，除了培养专业人士的专业，忽略了中国、印度、拉美、非洲，以及美国少数民族裔的文献及历史。在一次小型调查中，调查结果表明典型的大学毕业生离开大学的时候没有接触过欧洲和美国的哲学与文学。我写作此书的意图并非改变现有体系，因为我完全不相信这是可能的。对那些试图做些不一样的事情的人，也许这些观念会激发创造性。

目录

前言// I

第1章 知识工厂//1

第2章 高等教育还是高级培训? //14

第3章 美国的学术体系//35

第4章 学术工作和高等教育的未来//62

第5章 大学：谁将进来，谁又将离开//93

第6章 教什么，学什么//113

第7章 废除企业型大学//141

致谢//174

索引//175

第1章 知识工厂

1

这本书关注“更高层次”的学习以及在美国教授这种高层次学习的情况。相对于“教育”和“培训”来说，学习越来越难成为主要目的。培训给学生带来的是一种职业知识或者某种专门的技能知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研究生院训练学生进入某个专业领域。教育使得学生能够以一种与社会的价值和信仰相容的方式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不论学校传授的内容是什么，重点是帮助学生适应普遍的规则，而不是基于自己的优势和利益向学生灌输价值观。当学生能够认同社会和文化权威时，这样的教育就是成功的。

美国在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高中以上教育的投入上，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数十年来对多数人来说遥不可及的高中以上教育，现在对于大部分美国学生来说成了基本要求。在20世纪末，大约有一半的小学生和多于3/5的高中生进入了高中以上的教育机构。这么多年来，在文章中、课堂上、公开讲话中，我一直使用“高中以上”而不是“高等的”来描述美国的学院和大学。这是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些系统内教书，发现只有很少的能够实现“更高层次”学习的实例，尤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的本科教育只能达到50年前一个像样的中学的水平。相应地，除了在毕业论文阶段，研究生教育矢志于完成的不过是相当于以前较好的本科阶段的目标，而且还常常达不到这个标准。虽然不是法律上的，但在所有其他意义上，高中以上教育正迅速成为强制性的。我在本书中打算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很快地，大多数美国人平均花费在上学的时间将达到18~20年，而这意味着相当数量的人将花费更长时间来上学。

“二战”前夕，大约有150万学生进入了高中后教育机构。1941年，美